

抗战时期四川城市体系变迁研究

李映涛¹

【摘要】 抗战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核心区域，成为了国家建设的重点，特别是大量沦陷区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和人口内迁四川，促进了战时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四川城市也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城市规模得到发展，城市体系进一步完善。战时四川城市体系的建构和不断完善，不仅促进了战时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全面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对20世纪下半叶乃至今日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在四川城市发展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词】 抗战时期；四川；城市体系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6）11-0065-12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在全面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核心区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战略后方的重要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四川作为战时大后方的核心区域，成为了国家建设的重点，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四川城市也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

城市体系是指一个地区范围内由各个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市所组成的城市网络。四川地区城市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地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等级，在区域内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并相互作用和影响，初步形成了一个城市网络体系。这一城市体系在民国以来，特别是抗战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四川城市体系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变化，不仅促进了战时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全面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对20世纪下半叶乃至今日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抗战前四川城市体系

（一）抗战前四川城市行政建制体系

在古代中国，城市主要是作为一定区域内的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因此，“在从春秋战国时代至清朝的3千多年的发展中，从社会整体意义上说，城市始终是政治中心功能占主导地位，各级城市就是各级政府的治所在地，作为政治中心统治着乡村”^{〔1〕}。政治因素贯穿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的整个历程，深刻影响了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不同级别的行政中心逐渐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市。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行政建置就成为了城市体系构成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城市是区域发展的中心，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对城市的设置与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物产富饶、人口密集的区域内城市的分布也就更为密集，反之，在农业生产落后、人口稀少的地区城市的分布也就自然稀疏。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外，我国历

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内地城市贫困人口与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2CZS054）与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课题“民国时期内地城市贫困人口与社会变迁研究——以四川为例”（项目编号：12DFWH01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映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代皆以在一定区域内人口和赋税的数量作为设县的基本标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形成的等级差异，也对城市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川地区经过长期以来的开发和发展，到清代已形成了较为合理的行政建置和较为完整的城市体系。民国以后，在继承清代行政建置和城市体系的基础上，又有一些调整和改动，主要是废除府、州、厅，一律改县，还有一些县名的更改，而在城市的数量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清代实行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行政区划。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全国普遍废府州，实行省、道、县三级行政区划。民国初年，四川省的地方行政区划，也分为省、道、县三级制，废除府、州、厅，一律改县，清末川康地区已建设设治委员会的地区也一律改升为县。

1914年4月，又将原四川省边东、边西两道辖区析出而设置了川边特别区域（治康定），相当于省一级。1925年2月改名为西康特别区域。1928年6月，南京政府通过西康建省议案，将西康特别区域改为西康省，但未真正实行，暂由西康特别政务委员会治理，直至1935年7月，才于雅安设立西康建省委员会^[2]。

从民国元年至二十三年（1912~1934）这23年间，四川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之中，这一时期，行政区划建置变化很小，仅在1915年改东乡为宣化县；1928年全省裁道，各县直属省府^①；同年建置成都市；1929年建置重庆市，如此而已^[3]。1935年川政统一后，国民政府将四川全省划分为18个行政督察区和西康行政督察区，分辖各县。这样，四川省共辖2市、19个行政督察区、166个县和3个设治局^[4]。这一时期四川的行政建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四川城市体系的构成。除去附郭县性质的成都县、华阳县和巴县，这一时期四川省共有城市168座，城市密度大致为2.95座/万km²^[2]。

（二）抗战前四川城市的空间分布格局

近代四川城市是在历史时期四川城市的基础上发展和演变而来的，因此，在城市的分布与空间格局上也表现出极大的延续性，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四川地区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开发历史的影响，长期以来，各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不平衡。受其影响，四川地区的城市分布也呈现出不平衡性，区域差异明显。虽然受到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及政治和交通等因素变动的影 响，战前的四川城市在空间分布的具体情况有所变动，但空间分布不平衡的总体格局却一直没有改变。

1. 平原地区城市多，山地和高原地区城市较少

平原地区由于具有更为优越的耕作条件，开发历史较为悠久，农业生产更为发达，能承载更多数量的人口，城市分布也就相对密集，而山地和高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则较为恶劣，农业生产水平较为落后，人口相对稀少，城市的分布也就相对稀疏。此外，平原地区的交通条件也往往较山地和高原地区更为便利，也对城市的分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四川地区地域辽阔，地貌类型极为复杂，既有平原、丘陵，又有高原、山地，其中又以山地、高原、丘陵占绝对优势，平原面积狭小。以成都平原为例，抗战前，成都平原大致分布有绵竹、什邡、彭县、灌县、崇宁、广汉、新都、新繁、成都、华阳、郫县、温江、双流、新津、彭山、眉州、青神、崇庆、大邑、邛崃、蒲江、名山、丹棱、洪雅、夹江、峨眉、乐山、金堂、德阳等29市县，约占了战前四

² ① 温贤美主编，《四川通史》第七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页。另一说则为“当于民国十九年初废道”，参见傅林祥、郑宝恒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中华民国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页。

② 此处四川省面积采用《四川省志·地理志》（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撰：《四川省志·地理志（上）》，四川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统计数据，约57万平方公里。

川地区城市总数168个的17.26%，而成都平原总面积大约仅为四川地区总面积的1.41%，该区域城市分布之密集可见一斑。广大的山地，尤其是位于四川地区西部边缘的高原地区，虽然地域广阔，但城市的分布却十分稀疏。

2. 城市呈现出沿河流分布的特征

水源对于一个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管子·乘马》中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其说明明确指出了水源在城市选址中的重要性。河流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生活和生产的必需，而且也方便了交通往来。因此，城市沿河流分布成为了中国古代城市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四川地区境内河流众多，城市沿江河分布的特征尤为显著，绝大多数城市都分布于江河沿岸，形成了沿江河城市群，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大、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基本都分布于江河沿岸。

抗战前四川城市沿江河分布情况一览表

河流	城市	数量
金沙江	雷波、屏山、西昌、冕宁、会理、盐源、盐边、昭觉、炉霍、甘孜、白玉、石渠、道孚、九龙、雅江、得荣、	16
岷江	成都、温江、郫县、新津、崇庆、灌县、彭县、眉山、彭山、夹江、青神、蒲江、丹棱、洪雅、邛崃、大邑、名山、乐山、峨眉、犍为、峨边、井研、茂县、汶川、松潘、雅安、芦山、宝兴、天全、荣经、汉源、康定、泸定、丹巴、崇宁、	35
沱江	新都、资中、资阳、内江、荣县、仁寿、简阳、威远、大足、荣昌、德阳、广汉、绵竹、什邡、金堂、隆昌、富顺、新繁、乐至	19
嘉陵江	铜梁、合江、大竹、渠县、广安、岳池、蓬安、南充、营山、南部、武胜、西充、仪陇、遂宁、安岳、中江、三台、射洪、盐亭、蓬溪、潼南、绵阳、安县、梓潼、剑阁、广元、苍溪、阆中、平武、江油、北川、巴县、宣汉、开县、通江、南江、万源、达县、罗江、昭化	40
乌江	南川、彭水、黔江、酉阳、	4
长江	永川、江津、江北、巴县、合川、綦江、璧山、宜宾、南溪、江安、兴文、珙县、高县、筠连、长宁、纳溪、叙永、古蔺、涪陵、丰都、石柱、万县、奉节、开县、忠县、云阳、巫山、巫溪、邻水、垫江、长寿、庆符、城口、古宋、秀山	35

根据上表统计，战前四川城市中位于江河岸畔的达 115 个，占城市总数 168 个 68.45%，充分体现了四川城市沿河流分布的特征。其中，又以岷江、长江、嘉陵江沿岸为多。岷江、嘉陵江、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四川地区最为重要的水路交通动脉。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城市沿河流分布的这一趋势与沿交通要道分布的指向是大致重合的。

3. 重要城市呈现出沿主要交通线分布的特征

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必然会与本区域内的广大乡村以及区域外的其他城市

与乡村发生联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活动。因此,交通条件对于城市的分布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些交通条件较为便利的区域,城市的分布往往会较为密集,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城市,特别是一些较为重要的城市,常常会呈现出沿交通干线分布的格局。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四川的对外交通极为不便,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成渝两地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交通网络系统,各级城市在这个交通网络系统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通过这个交通网络系统,使得各城市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奠定了四川城市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抗战前四川地区的交通环境在前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城市间除了原有的驿路相通,还新修了公路,引入了汽车这一现代运输方式,此外,沿岷江、嘉陵江、沱江、涪江、长江等江河的水运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轮船这一现代交通工具的引入,对四川地区的交通运输状况改善有着积极的作用。如前所述,民国时期四川的城市基本都位于河流沿岸,特别是区域中心城市基本都位于岷江、嘉陵江、长江等巴蜀地区的重要水路交通动脉沿线,就充分说明了交通条件对城市分布的重要意义。

总之,抗战前四川城市之间的交通有了一定发展,这些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构成了抗战前四川城市间的交通网,推动了城市之间的联系,为四川城市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利条件。四川地区的重要城市正是大都位于该交通网中的主要交通枢纽上。

二、抗战时期四川城市体系的发展变迁

(一) 抗战时期四川城市行政建置的变迁

适应战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抗战时期的四川城市行政建制体系的也发生了改变,主要为重庆升为中央直辖市并成为中华民国陪都,以及西康省的成立,此外还新建了自贡市。除此以外,与战前相比,并无其他大的变化。

1935年川政统一以后,国民政府于1935年10月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以便“统率川黔康三省剿匪军事,并统筹各该省份之后方善后”⁽⁵⁾。重庆行营成为了国民政府控制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重要军政机关。1937年11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国府迁渝于抗战前途》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⁶⁾。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⁷⁾。之后,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各机关陆续迁往重庆。1938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迁至重庆,重庆成为了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但此时重庆仍是四川省政府管辖的省辖市,而其组织机构则“拟暂准援照直隶市之组织”⁽⁸⁾。1939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向国防最高委员会提议:“查重庆向为西南重要商埠,现已蔚成政治文化中心,该市政府虽系援照直隶市组织,因事务日繁,其行政系统及政权,亟需明确规定,以资运用。兹为促进行政效率,适应实际需要,拟将该市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提议获得通过,国民政府明令公布“重庆市著改为直隶于行政院之市”⁽⁹⁾。至此,重庆升为了中央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明确指出重庆“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闳建置,民意仝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¹⁰⁾。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成为了战时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仅给重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对四川乃至大后方的城市体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重庆从区域中心城市跃然而为了全国性都市。

西康建省之议始于清末。1914年4月,将原四川省边东、边西两道辖区析出而设置了川边特别区域(治康定),相当于省一级。1925年2月改名为西康特别区域。1928年6月,南京政府通过西康建省议案,将西康特别区域改为西康省,但未真正实行,暂由西康特别政务委员会治理,直至1935年7月,才于雅安设立西康建省委员会⁽¹¹⁾。1938年9月,又重新划入原属四川省的宁属8县(西昌、会理、盐源、越嶲、冕宁、宁南、昭觉、盐边)1局和雅属6县(雅安、芦山、宝兴、天全、荥经、汉源)1局归西康管辖。1939年1月1日正式成立西康省(省会康定)。西康省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加强中央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巩固了西南边防,也推动了四川西部及周边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该地区城市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贡地处四川盆地南部，以盛产井盐闻名，“所出之特产，向以盐业为大宗，出产之丰为全省之冠，商业富庶，人口众多”⁽¹²⁾，逐渐发展成为了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抗战以来，随着东中部产盐区的沦陷，自贡成为战时大后方的主要产盐地，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持，同时，内迁至自贡的各大盐业公司以及各盐业相关工厂也进一步推动了自贡盐化工产业的发展，“自贡地位日见重要，盐业愈形发达”⁽¹³⁾，要求设置自贡市的呼声大起。自贡市的设立，几经波折，“贡井原属荣县辖区，自流井原隶富顺，因贡井与自流井同为产盐区域，人口日增，商务畅茂，经济活跃，行政繁重，经四川盐管局，本市筹委会暨各业同业公会，数度呈请设市，乃于二十六年一月奉准设立，自贡特种警察局整理地方治安，作为设立市政机关准备。二十七年六月，自贡市政筹备处奉令成立，市区范围从此确定，划拨富顺七乡镇、荣县三乡镇，共十乡镇为自贡市区。二十八年九月奉省令成立自贡市政府，至三十一年八月经行政院正式批准设市”⁽¹⁴⁾。自贡建市不仅进一步推动了自贡城市的发展，也为战时自贡盐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保障，为保障战时军需民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抗战时期四川城市规模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的政府机关、学校、工厂企业以及大量人口内迁，使得四川各城市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在城市人口规模方面，抗战时期，大量东部沦陷区的人民迁入四川，特别是四川各大中小城市，使得抗战时期四川的城市人口有了较大增长。抗战时期内迁四川的人口具体数字，众说纷纭。但无论依据何方的数据，都可以确定，抗战时期的四川曾接纳了大规模的外省移民。虽然从战时四川省（包括西康、重庆在内）人口的历年统计数据来看，人口规模变动不大，基本保持在 4850 万左右，处于停滞状态⁽¹⁵⁾。几乎看不出外省人口流入对四川人口规模变动的影响，这应该主要是因为战争伤亡、战时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大量军队出川等因素带来的四川人口的减少与人口流入相抵消的结果。虽然战时四川的总人口处于一个停滞状态，但这一时期四川城市的人口却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重庆、成都、万县等城市人口，更是急剧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内迁的各机关、工厂、学校等，大都位于城市之中，同时城市能提供更多的谋生手段和生存空间，因此容纳和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其次，抗战期间，四川农村中普遍存在强征壮丁入伍现象，而城市人口中被抓壮丁的比例则相对较少，因此导致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被迫逃亡到城市中以躲避征兵，也是四川城市人口猛增的重要原因。当时有人估计，滞留在全川城市（可能包括小城镇）的青年壮丁“当有百万”⁽¹⁶⁾。此数据虽不一定准确，但从抗战期间重庆人口性别比例中，也可大致推断，当时应该是有大批青壮年男性流入了重庆市。根据相关统计，重庆市在 1939 年、1945 年和 1948 年的性别比例，分别高达 164、149 和 138，这种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例，显然主要缘于大批青壮年男性的流入⁽¹⁷⁾。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带来了抗战时期四川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

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之初，成都城市人口约为 52 万人⁽¹⁸⁾，重庆城市人口约为 47 万人⁽¹⁹⁾。其后，随着抗战不断深入，外省移民大量向四川迁入，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1946 年，重庆城市人口达 124 万多人⁽²⁰⁾，为战前人口的 2.63 倍，开创了四川城市发展史上的新纪录。1946 年成都人口为 76 万多，为战前人口的 1.4 倍⁽²¹⁾。除成渝两地外，其它四川城市人口也有了较大增长，如泸州、宜宾、广元等城市人口也成倍增加。

在城市经济规模方面。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四川，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交通不便，远离中国近代兴起的经济中心，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市场的联系薄弱，加之政治混乱，军阀割据，战争频仍，赋税沉重，阻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及沿江等城市，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缓慢，除部分城市有少数规模不大的工厂外，相当部分城市都没有现代机器工厂。

从上表可知，抗战前四川工厂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也小。其中在工厂数量、工人数额上占 90%左右的主要为纺织及火柴等轻工业，而这些工厂，绝大多数都是不使用动力的，严格而言，仍属于工场手工业性质。现代机器工厂在工厂数量和工人数额上只占 1%左右。其次，就工厂分布看，重庆是抗战前四川最大的工业区。上表中的工厂，十之七八是设立于重庆或其附近的；同时，重庆的电力公司的发电，有相当大的比例被用作了工厂动力，这是别的城市，即使是成都的电厂也没有的现象。总之，

抗战前的四川工业相当不发达，据统计，抗战前四川的工厂数仅占全国的 2.93%，工厂资本仅占全国的 0.58%，工人数仅占全国的 2.85%^{〔22〕}。工厂的分布也很不平衡，相当部分城市都没有现代机器工厂。

抗战爆发后，四川作为民族复兴的后方基地，成为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社会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沿海沿江城市相继沦陷，这些城市中的部分工厂、企业、设备和技术人员纷纷内迁至四川。“四川地处西陲，工业落后，已设之工厂数量及范围均甚狭小。惟自抗战以来，沦陷区工厂内迁，及因外货来源断绝，新兴工厂乘机而起”。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处统计，截至1944年底，四川省已呈报登记的合乎工厂法的工厂共计2382家，资本共计25亿余元，平均每家仅有资本107万元。就工厂业务性质而言，以化学工业为最多，计670家，其次为机器工业494家，饮食品工业408家，纺织工业333家，五金工业155家，电气工业86家，冶炼工业65家，服饰品工业及印刷文具工业各58家，其他各业55家。各种工厂多集中于重庆市区，计1518家，分布于四川其它地方的仅有864家。从工厂设立年份分析，成立于战前者，仅占1/20，成立于战争开始以后者占19/20。尤以1938年以后至1942年止，新设立之工厂逐年增加。如1938年成立77家，1939年成立170家，1940年成立248家，1941年成立366家，至1942年达最高峰，成立609家。1942年以后，每年成立之工厂家数反而渐趋减少，如1943年成立454家，1944年仅成立290家。自抗战以来迁入四川之工厂共达254家，截至1941年底共有207家已复工，其中机械工业94家，化学工业33家，教育用品工业27家，纺织工业21家，其他工业32家。迁川机械材料共达45000公吨，其中纺织业20000公吨，机械工业9980公吨，其他各业共计14800公吨。随工厂迁入之技术工人截至1941年底共达8105人（自行车川及工厂迁人后来川者未计入），其中机械工人3900余人，纺织工人797人，化学工人688人，其余各业迁入工人3300余人^{〔23〕}。总之，抗战时期是四川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短短四五年的时间，使工业落后的四川‘迎头而上’的走完了东南先进省区五六十年的迁缓发展的过程”^{〔24〕}。四川工业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对战时四川城市经济规模变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战前四川工业统计^①

类别	厂数	百分比	资本数 (千元)	百分比	工人数	百分比
总计	583	100	6458	100	18710	100
缫丝工业	20	3.4	1500	23.1	6276	23.6
丝织工业	1	0.2	30	0.5	30	0.2
棉织工业	462	79.3	1130	17.5	4340	23.2
食品工业	6	1.0	390	6.1	128	0.7
火柴工业	34	5.8	446	7.0	5969	31.9
肥皂工业	18	3.1	300	4.6	400	2.1
皮革工业	3	0.5	200	3.1	270	1.4
玻璃工业	12	2.1	377	5.1	150	0.8
造纸工业	1	0.2	80	1.2	80	0.4
制卤工业	2	0.3	130	2.0	140	0.8
土石工业	2	0.3	1210	18.7	129	0.7
炼油工业	4	2.4	130	2.0	570	3.0
电器工业	2	0.3	35	0.5	18	0.1
机械工业	5	0.9	500	7.8	210	1.1
冶炼工业	1	0.2	—	—	—	—

3

抗战时期的四川工厂不仅在数量上有了飞跃，在分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如前所述，除部分城市有少数规模不大的工厂外，

³ ① 资料来源：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载《四川经济季刊》，1943年第1卷 第1期，第19页。

相当部分城市都没有现代机器工厂，抗战时期，虽然工厂集中于某几个城市，特别是重庆的分布格局并没有改变，但随着战时四川工业的发展，四川各大小城市中都相继出现了数量和规模不等的现代机器工厂，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变。

四川工厂家数及资本^①
(截至民国三十三年底)

类别	家数			资本 (千元)		
	合计	四川	重庆	合计	四川	重庆
总 计	2382	864	1518	2542522	1134397	1408125
化学工业	670	288	382	704012	426978	277034
机器工业	494	58	436	376252	180684	195568
饮食品工业	408	213	195	231790	163221	68569
纺织工业	333	180	153	307725	181403	126322
五金工业	155	52	103	96602	37515	59087
电器工业	86	9	77	90653	33320	57333
冶炼工业	65	38	27	618988	93580	525408
服饰品工业	58	10	48	16828	4128	12700
印刷文具工业	58	10	48	45192	8630	36562
杂项工业	55	6	49	54480	4938	49542

迁川工厂之地理分布^②

类别	川东	川西	川中	川北	不明者
总计	324	7	2	1	11
冶炼工业	1				
机器工业	98	1	1	1	3
电器工业	15				2
化学工业	35	2			3
纺织工业	21	2			
饮食品工业	8	1	1		
文化工业	29				3
其他工业	14				
矿业	3	1			

*4

从上表中可知，迁川工厂中“90%以上均在川东、靠近重庆巴县一带”⁽²⁵⁾。重庆是战时四川工业发展最快的城市，全市工矿企业增至 16 9 0 家，工业职工 10 万人，占当时国统区工厂总数的 1/3⁽²⁶⁾。除重庆外，各县市工厂之分布以成都市、乐山、巴县、宜宾 4 县市为最多，成都市有工厂 52 所，乐山 25 所，巴县 22 所，宜宾 21 所⁽²⁷⁾。除成都外，重庆、乐山、巴县、宜宾

⁴ ① 资料来源：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四川省统计提要》，1945年版，第30页。

② 资料来源：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载《四川经济季刊》，1943年第1卷第1期，第30页。

皆位于长江沿岸，关于长江航运对近代四川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总之，在抗战时期，四川城市工业虽然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大中小城市中都相继出现了数量和规模不等的现代机器工厂，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工业还是相当落后。

此外，经过抗战时期的发展，四川城市工商业与金融业也都有了很大发展，城市经济规模扩大。与此同时，城市经济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地区城市发展差距不断增加，以重庆、成都为代表的部分中心城市得到较大发展，其余城市经济虽也有了较大发展，但与主要中心城市，特别是重庆的经济规模之间的差距却是在不断扩大。

（三）抗战时期四川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变化

如前所述，行政建置是中国城市体系构成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任何一级行政区划建置都是以一定地域内的人口、经济规模为基础，并根据地理形势、政治军事需要等因素确定的。一般来说，在同一区域内，行政区划建置的等级就决定了治所城市的等级规模。当然，即使在同一区域内，同一等级的行政区划治所城市规模也存在差异。在对城市规模的研究中，一般会采用经济规模、用地规模以及人口规模等指标进行具体分析研究。由于资料的缺乏，在对抗战时期四川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的研究中则难以使用以上常用指标进行系统研究，只能作一般性探讨。另一方面，民国政府按事务繁简、财赋多寡等标准将县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当时四川城市等级规模体系的重要参考指标。

县制是我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稳固的一级建制。自从秦朝县成为行政区划基层单位之后，县即有了等级之别。历代多以户口多少、粮赋多少以及政治地理位置的差异等指标作为县等级划分的标准。民国初年，县制十分混乱，跟据内政部民政司于1919年3月打印的《全国州道县等级员名表》介绍，京兆地方县分为特别一等（在兴、宛平）及普通三等，直隶、山东等省之县则分为一二三等，而同时有的省（如河南）的县却没有分等。针对这种混乱状况，1926年国民政府全面改革县政制度，以事务繁简、财赋多寡将县分为一二三等。1939年，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县按照其面积、人口、经济、文化、交通等状况分为三至六等，由各省府划分^{〔28〕}。

民国初年，四川各县等级，仍沿清例，维持旧有等次，后因交通进步，实业发展，各县之人事变更愈大，原列等次，多与实际情形不符，有失平允。1935年11月，由四川省民政厅根据各县所报送的人口、面积、财赋及交通营业情形等材料，并参照各省先例，厘定各县县等标准，提经省务会议议决，发交各区行政督察专员，签发意见，再提交会议讨论决定，最终重新拟定了全省各县等级。按照当时的划分标准，1935年四川共有一等县37个，即：华阳、灌县、崇庆、彭县、资中、内江、荣县、眉山、邛崃、乐山、犍为、涪陵、万县、开县、遂宁、安岳、中江、三台、绵阳、绵竹、广汉、达县、仁寿、简阳、巴县、江津、江北、合川、宜宾、泸县、富顺、渠县、广安、梁山、长寿、南充、岳池^{〔29〕}。

抗战时期随着四川城市的发展变迁，四川各城市等级结构也发生了调整变化。

四川省各县等级变更 (1935年至1945年) ^①

区县市别	1935年 原定县等	1938年 改定县等	1940年实 施新县制 厘定县等	1940至 1945年设 局改现后之 县等
第一区共计				
温江	2	2	3	3
成都	1	2	3	3
华阳	1	1	2	2
灌县	1	1	3	3
新津	1	2	3	3
崇庆	1	1	2	2
新都	2	2	3	3
郫县	2	2	3	3
彭县	1	1	2	2
新繁	3	3	4	4
崇宁	3	3	4	4

5

⁵ ① 本表未包括划归西康省属各县以及重庆中央直辖市和成都、自贡两个省辖市。资料来源：四川省政府统计处：《四川省统计提要》，1945年版，第253—260页。

第二区共计				
资中	1	1	1	1
资阳	1	2	2	2
内江	1	1	1	1
荣县	1	1	1	1
仁寿	1	1	1	1
简阳	1	1	1	1
威远	2	2	2	2
井研	3	3	4	4
第三区共计				
永川	1	2	2	2
巴县	1	1	1	1
江津	1	1	1	1
江北	1	1	2	1
合川	1	1	1	1
荣昌	1	2	2	2
綦江	2	2	2	2
大足	2	2	2	3
璧山	2	2	2	2
铜梁	2	2	2	2
北培管理局	—	—	—	—
第四区共计				
眉山	1	1	2	2
蒲江	1	3	4	4
邛崃	1	1	1	1
大邑	1	2	3	3
彭山	2	2	4	4
洪雅	3	3	4	4
夹江	3	3	4	4

区县市别	1935年 原定县等	1938年 改定县等	1940年实 施新县制 厘定县等	1940至 1945年设 局改现后之 县等
青神	3	3	6	6
丹棱	3	3	5	5
名山	3	3	5	5
第五区共计				
乐山	1	1	2	2
屏山	2	1	2	3
马边	1	1	4	4
峨边	1	1	4	4
雷波	1	1	4	4
犍为	2	1	2	2
峨眉	3	2	3	3
沐川	—	—	—	5
第六区共计				
宜宾	1	1	1	1
南溪	2	2	3	3
庆符	2	3	4	4
江安	2	2	3	3
兴文	2	3	5	5
珙县	2	3	5	5
高县	2	3	4	4
筠连	2	3	6	6
长宁	2	3	4	4
沐双设治局	—	—	—	—
第七区共计				
泸县	1	1	1	1
隆昌	1	2	2	2
富顺	1	1	1	1
叙永	1	2	2	2
合江	2	2	2	2
纳溪	3	3	5	5
古宋	3	3	5	5
古蔺	3	2	3	3
第八区共计				
酉阳	1	1	2	3
涪陵	1	1	1	1
丰都	2	2	2	2
南川	2	2	3	3
彭水	2	2	3	3
黔江	2	2	3	3
秀山	2	1	2	2
石柱	2	3	3	3
武隆	—	—	—	5
第九区共计				
万县	1	1	1	1
奉节	1	2	2	2
开县	1	1	2	2
忠县	1	2	2	2
巫山	2	2	4	4
巫溪	2	2	4	4
云阳	2	2	2	2
城口	2	2	5	5

区县市别	1935年 原定县等	1938年 改定县等	1940年实 施新县制 厘定县等	1940至 1945年设 局改现后之 县等
第十区				
大竹	1	2	2	1
渠县	1	1	1	1
广安	1	1	1	1
梁山	1	1	1	2
邻水	2	2	3	3
垫江	2	2	4	4
长寿	2	1	2	2
第十一区共计				
南充	1	1	1	1
岳池	2	1	1	1
蓬安	2	2	4	4
营山	2	2	3	3
南部	2	2	2	2
武胜	2	2	3	3
西充	3	3	4	4
仪陇	3	3	4	4
第十二区共计				
遂宁	1	1	1	1
安岳	1	1	1	1
中江	1	1	1	1
三台	1	1	1	1
潼南	2	3	3	3
蓬溪	2	3	2	2
乐至	3	3	3	3
射洪	3	3	3	3
盐亭	3	3	4	4
第十三区共计				
绵阳	1	1	1	1
绵竹	1	1	2	2
广汉	1	1	2	2
安县	2	2	3	3
德阳	2	2	3	3
什邡	2	2	3	3
金堂	2	2	2	2
梓潼	3	3	4	4
罗江	3	2	4	4
第十四区				
剑阁	3	3	3	3
苍溪	3	3	4	4
广元	2	2	2	3
江油	2	2	3	3
阆中	2	2	3	3
昭化	3	3	5	5
彰明	3	3	4	4
北川	3	3	6	6
平武	3	2	2	3
青川	—	—	4	4
旺苍	—	—	—	4
第十五区共计				
达县	1	1	1	1

区县市别	1935年 原定县等	1938年 改定县等	1940年实 施新县制 厘定县等	1940至 1945年设 局改现后之 县等
巴中	1	2	1	2
开江	2	2	3	3
宣汉	2	2	2	2
万源	2	2	3	3
通江	3	2	3	3
南江	3	2	4	4
第十六区共计				
茂县	2	1	3	3
理番	1	1	2	2
懋功	1	1	4	4
松潘	1	1	2	2
汶川	3	2	4	4
靖化	2	2	2	3

从上表可知，四川省各县等级自 1935 年至 1945 年 10 年间，为适应需要，时有调整。1935 年，全省一等县有 54 县，二等县有 53 县，三等县有 28 县。1938 年，全省一等县有 47 县，二等县有 57 县，三等县有 31 县。1940 年实施新县制，重新厘定县等，全省一等县有 26 县，二等县有 39 县，三等县有 32 县，四等县有 27 县，五等县有 8 县，六等县有 3 县。迄 1945 年止，全省一等县有 26 县，二等县有 34 县，三等县有 37 县，四等县有 29 县，五等县有 10 县，六等县有 3 县^⑥。至此，四川城市规模等级结构从抗战前的市县两层四级城市规模等级结构演变为市县两层七级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城市规模等级结构更趋丰富和合理，对于加强各城市间的联系，协调各城市间的分工协作，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丰富，也适应了战时四川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体现了抗战时期四川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

三、战时四川城市体系发展变迁的特点

抗战时期，四川各级城市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各城市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不断加强，城市体系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战时四川城市体系的发展演变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首位城市重庆地位突出

在古代四川的城市体系中，无论是从城市的行政等级，还是从城市规模或繁华程度而言，成都都毫无疑问是四川地区的首位城市，其作为四川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地位十分突出。近代以来，重庆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在开埠后，重庆因其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逐渐取代了成都作为传统西南地区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成为了四川乃至西南的商业贸易中心，为“内地贸易之最大集散市场，即滇、黔、甘、陕、康邻近川省各地之进出商品，亦多以重庆为转运口岸，故商业之盛，西南各都市中，殆无出其右者”^{〔30〕}。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重庆的工业、金融业以及运输业等也有了很大进步，逐渐成为了四川的经济中心。成都的经济地位虽不及重庆，但仍在四川的城市经济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视为次经济中心。此外，成都作为四川的政治中心的地位没有改变。因此，这一时期的四川城市体系中存在有成都、重庆两个中心，是为双核城市体系。抗战以后，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和战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获得了飞跃发展，无论是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城市建设还是城市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上都与川内其他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差距。首位城市重庆地位过于

^⑥ ① 未包括划归西康省属各县以及重庆中央直辖市和成都、自贡两个省辖市。

突出，加剧了四川城市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四川城市的协调发展，也对区域社会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城市规模普遍偏小

抗战时期，四川城市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然而，若与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比较，除重庆等个别城市外，城市规模依旧普遍偏小。就人口规模而言，如前所述，除重庆、成都、万县和泸县外，其余城市人口均在 10 万以下。5 万人以上的城市亦不多，除南充、合川、江北在 5 万人以上外，余皆在 5 万人以下，城市人口仅有几千人的也不少见。就城市的地域规模而言，则普遍在 2 平方公里以下。

20世纪40年代四川部分城市地域规模表^①

城市名	城市面积	备注
乐山	1.5平方公里	《乐山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志》页16
犍为	0.6平方公里	《犍为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41册，民国16年，第66页。
内江	2.3平方公里	新修《内江市志》页111
南充	1.68平方公里	《南充城乡建设志》
三台	城内面积九百余丈	《四川经济月刊》第11卷第1、2期，《三台城内及近郊的地理调查》。
遂宁	1.1平方公里	《遂宁县志》第十四编，页479，《城乡建设》。
广元	2平方公里	新修《广元县志》页74
宜宾	2.02平方公里	丘信：《宜宾地价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大陆土地资料》，第79册。

7

（三）政治军事因素对战时四川城市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如前所述，抗战时期，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核心区域，成为了国家建设的重点，社会经济得到了相应发展，特别是随着沿海沿江的城市相继沦陷，这些城市中的不少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和人口纷纷内迁至四川，带来了四川城市的快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军事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四川城市的发展带有典型的战时经济的特征。因此，四川城市因抗战内迁而得到飞跃发展，自然也同样因为抗战结束后，政府机构、工矿企业、教育机构等回迁，特别是国内战争的爆发而受到严重影响出现衰落。以成都、重庆为例。在城市人口方面，1945 年至 1948 年间，重庆城市人口由 120 余万迅速下降到 98.5 万，成都城市人口也从 70 余万下降到 64 万。这应该主要是由于抗战胜利后大量难民返乡所导致的。在城市经济方面。据 1946 年初统计，重庆的内迁工厂中，有 122 家停业和东迁，其中以机器制造业为主，达 98 家；另有化学工业 3 家、纺织工业 1 家、电器制造业 15 家、钢铁业 3 家，其他企业 2 家。1946 年下半年有“大批工业设备，从重庆运到下游的汉口、上海和沿海地区”^{（31）}。到 1946 年 6 月底，成都原有之造纸、化学、染织、机械等 80 余家工厂中，已有 18 家倒闭，其余有三分之一歇业。战时纸烟业一度兴盛，工厂达到 327 家，倚之为生者约 10 余万人，1946 年 4 月倒闭者达 230 家，失业者达 7000 之多，全市工商税仅达到预算的 40%^{（32）}。凡此种种，不胜列举。总之，随着抗战的结束和国内战争的相继爆发，四川的城市人口出现大幅下降，城市经济呈现衰退，体现出政治军事因素对四川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

⁷ ① 转引自：田永秀：《近代四川沿江中小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四川大学 1999 年，第 24—25 页。

总之，抗战时期，四川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初步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以成都为次中心，以自贡、万县、泸县等若干中小城市为基础的城市体系。虽然战时四川城市体系的发展仍具有种种时代局限性，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但战时四川城市体系的建构和不断完善不仅促进了战时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全面抗战的长期坚持和最终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在四川城市发展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 张鸿雁. 论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特点 [J]. 中国史研究, 1997, (3).
- (2) 郑宝恒. 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略(1912—1949)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2).
- (3) 蒲孝荣. 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491-492; 四川通史. 第七卷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241.
- (4) 蒲孝荣. 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 [M].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492.
- (5)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组织大纲 [Z].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42.
- (6) (7) 蒋介石. 国府迁渝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 [A]. 重庆档案馆, 重庆师范大学合编.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 [C]. 重庆出版社, 2014. 5, 6.
- (8) 魏道明为行政院通过《重庆市准援照直隶市组织案》致重庆市政府笺函 [A]. 重庆档案馆, 重庆师范大学合编.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 [C]. 重庆出版社, 2014. 42.
- (9) 国民政府为改重庆市为直隶市给行政院训令 [A]. 重庆档案馆, 重庆师范大学合编.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 [C]. 重庆出版社, 2014. 51.
- (10) 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 [M]. 重庆档案馆, 重庆师范大学合编. 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迁都、定都、还都 [C]. 重庆出版社, 2014. 87.
- (11) 郑宝恒. 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略(1912—1949) [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2).
- (12) 出产丰富冠全省, 川当局筹建自贡市 [J]. 西北导报, 1937, (3).
- (13) (14) 张孝沐. 自贡市经济概况 [J]. 四川经济季刊, 1944, (4).
- (15) 李世平, 程贤敏主编. 近代四川人口 [M]. 成都出版社, 1993.
- (16) 任乃强. 五百万壮丁 [N]. 农村周报, 1947-9-3.

-
- (17) 李世平,程贤敏主编.近代四川人口[M].成都出版社,1993.113.
- (18) 警察旬报(成都)[J].1937,(16).
- (19) 四川省政府编.四川统计月刊[J].第1卷第1期.
- (20) 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M].1946.10.
- (21) 四川省政府编.统计月报[J].1948,(第4卷).
- (22) 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J].四川经济季刊,1943,(1).
- (23) (27) 四川省政府统计处编.四川省统计提要[M].1945.30—33,34.
- (24) 李紫翔.抗战以来四川之工业[J].四川经济季刊,1943,(1).
- (25)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52.
- (26) 重庆年鉴(1987年)[M].科技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7.3.
- (28) 马春笋.县分等的历史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2).
- (29) (30) 四川省政府编印.四川省概况[M].1937.14,75.
- (31)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M].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 (32) 成都市工厂经营状况[N].新华日报,1946-6-29.